

古典文学选讲

GUDIAN WENXUE XUANJIANG

(二)

宁波地区教师进修学院编

古典文学选讲

第二辑

两汉魏晋南北朝唐时期

宁波地区教师进修学院编

1980年10月

目 录

- 一 司马迁和《史记》 夏重宣(1)
- 二 教学相长 因材施教
 - 读《学记》三则 凌 坚(15)
- 三 “长诗之圣”
 - 漫谈《孔雀东南飞》 吕 萍(19)
- 四 曹操和建安文学 谷 佩(28)
- 五 《观沧海》《龟虽寿》试析 史美成(32)
- 六 陶渊明和《桃花源记》 梅 溪(38)
- 七 唐诗概说 陈康白(45)
- 八 千奇万险不可攀
 - 读《蜀道难》 胡其章(68)
- 九 惟歌生民病
 - 读《卖炭翁》 肖 涵(72)
- 十 论唐宋韩柳欧苏的散文成就 全世垣(76)
- 十一 熟读古文 掌握规律
 - 古汉语基础知识(二) 韩烈沼(99)

司马迁和《史记》

夏重宣

一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龙门（今陕西韩城县）人，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卒年约在公元前90年前后（武帝末年或死后），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家和文学家。他所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辉煌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太史令，掌握大量文献掌故，学识渊博，精通天文学、易学、黄老学。他的《论六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都有所肯定，有所批判，最推崇道家，在当时是一个有独特见解的思想家。他早就有志编写一部新的史书，上承《春秋》，下绍汉代“明世”，并已积累材料，做了初步整理工作。临终时叮嘱司马迁“毋忘吾所欲论著”。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悉论先人所次旧闻”、“父子相续纂其业”。司马谈的学识和思想，及写史的准备工作，是司马迁的家学渊源，对他影响很大。临终遗言更是写《史记》的直接推动力量。

司马迁十岁就开始诵习古文，后来又跟经学大师董仲舒学公羊，跟孔安国学古文尚书。又掌握了天文历算知识。公元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父死。后三年司马迁任太史令，

时仅二十八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袖史记石室金匮之书”，饱览国家藏书和当时的文献档案，对先秦和秦以下的政治和学术思想斗争有深刻的理解，为写史作了准备。勤奋学习，博览群书，积累知识，这是编写巨著的基础。司马迁并不满足于阅读古书，他更游历各地，调查研究，访问遗事逸闻，以资查证。自序说：“二十而南游江淮，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登因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又据《河渠书》、《五帝本纪赞》和许多列传所载，他访问过五帝遗事，到过许由冢所在的箕山，调查过舜南巡的传说，考察过禹治水的遗迹，瞻仰过孔孟的故乡和庙堂礼仪，搜集过信陵君遗事，并到过侯生所守的夷门，又看过春申君的故城宫室，凭弔屈原的沉渊，观察蒙恬所筑的长城，还到过楚汉相争的中心地区薛、彭城等，访问过韩信的故乡，搜集刘邦、项羽、萧何、曹参、樊哙、滕公的遗事，还到江南了解龟和蓍的形态、生活条件和效益。漫游中采访遗闻逸事，了解民情风俗，观赏了壮丽山河。公元前111年，他奉使西征巴蜀（观察、安抚西南地区），乘机了解了这个地区的山川形势和民族风尚。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广大地区，接触了各种人物，广泛的阅历增长了知识和分析判断的能力，增强了对广大人民的感情。所以能写出《史记》这样优秀的巨著。

他在汉武帝身边做过郎中，是个“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的小官。他长期随从，颇得宠幸，因而能对当时最高统治集团的内幕，明争暗斗的情况，有直接的了解，成为写史的重要的活材料。公元前98年（天汉三年），为了替李陵申辩，触怒汉武帝下狱，受残酷的宫刑，对他是莫大的侮辱，使他更深刻地认识专制统治的黑暗，看穿了官场现实的丑恶；他更下决心

学古圣贤发愤著作，准备把它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所以含垢忍辱，坚持写《史记》，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创作，终于完成这部伟大的著作。这种顽强的毅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书成后不久，这位伟大的史学家兼文学家就去世了。

综观司马迁的一生，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首先是他有高度的爱国爱民的思想感情。他写史记的目的原来就是要承父业继《春秋》，褒贬当世，起补敝起废的作用。所以“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这就是说要以古为鉴，研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发挥他自己的专长贡献于国家，希望对当代政治有所裨益。他热烈歌颂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英雄人物和农民起义领袖，称道一些明君贤相，严厉贬斥佞臣酷吏以及统治阶级中的罪恶行为。他希望统治阶级能减轻剥削与压迫，让劳动人民能有一定限度的利益。虽然他的根本思想是使封建国家能长享太平，但作为两千年前的封建阶级的历史家，能对劳动人民深表同情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是符合劳动人民的愿望的。他这种爱国爱民的思想感情，使他的作品闪耀着光芒。其次是创作中的求实精神。他对历史事实，不但博览群书互相参证，而且作广泛的实地调查，认真核对，宁缺毋滥。对于实际存在的事情，他敢于秉笔直书，绝不阿世避讳。所以能深刻揭露批判古代和当世的问题，对历史人物以至当代帝王能刻划入微，寄托其褒贬和爱憎，达到现实主义的高度成就。扬雄、刘向等称赞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是符合实际的。

另外，他敢于解放思想，伸张正义，并有坚定的毅力，这也是非常突出的。当时汉儒已成为汉王室的追随者，阿世趋奉，随

俗浮沉。所谓儒学 经过 董仲舒的改造，与黄老、刑、名相杂糅，而且有很大的阴阳五行的迷信成份。司马迁博通今古文经学，特别是董仲舒的公羊学，而能不受经学的束缚，更不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独树一帜，这表明他敢于解放思想，有卓越的见识，而且是富有斗争精神的。特别是在下狱受宫刑之后，内心极度苦闷的情况下，能在狱中坚持写《史记》；出狱后，担任中书令，继续含垢忍辱，坚持到完成这部巨著，更显出其坚韧不拔的毅力。

二

《史记》是一部光辉的历史巨著，也是杰出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它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体制，其中十二本纪按年月记载历代重大事件，是全书的总纲。三十世家记载西周至战国的诸侯国家史及西汉一些功臣、宗室外戚受封者。列传有重要人物传，有特殊事业传，有少数民族传，有藩属国传，有外国传，范围很广。以上基本上以人物活动为主。另有十表，分世表、年表、月表，以同类的大事排在一起，简要醒目。八书，总述文化方面的成就，其中天官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反映天文、历数、地理、经济方面的知识，意义更为重大。以上五体详略互见，血脉相连。《史记》通过这种体制1、反映了三千年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社会各种矛盾；2、以帝王为中心写了二千多年历史，它改变了分国割据的历史概念，树立了历史的正统观与统一观，在我国起过稳定与巩固的作用。3、把历史的范畴从政治上极少数最高的贵族扩展到社会各阶层，包括最下层，刻划了各种人物的活动。4、总结了各方面经验，保存了大量古文化，能反

映政治与经济、文化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表明了经济对政治的重大作用。这种历史体制的创立是司马迁的卓越贡献。这种体例也体现了封建政权的伦理纲常，树立了明君贤相的模式，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不但符合当时时代的需要，而且也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欢迎，所以汉以下直到新元史、清史稿等廿五史都采用它。应当指出，以帝王为中心写史，突出帝王将相的历史作用，是英雄史观，属于唯心主义的，是应该批判的。但也应看到《史记》并不认为君主万能，也不歌颂专制主义的孤家寡人，而能注意到任用贤才，注意到民心向背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二千多年以前能看到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史记》主要是以写人物活动来反映历史的演变。它运用优美丰富的语言，明达流畅的文笔，精巧多样的情节安排，记叙人物的活动，深入刻划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与精神面貌，塑造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在形象中表明爱憎，在记叙中体现褒贬。它也通过细腻的描绘揭露了社会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反映了社会的真实。书中渗透了作者的爱国思想和同情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寄托了作者对专制黑暗统治的不平，洋溢着诗的激情，很多篇目做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有强烈的感染力，鼓动力，能扣人心弦，百读不厌，能使读者对当时社会有深刻的认识，对后世的教育作用很大。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为了方便起见，分述如下：

(一)思想内容：

《史记》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深厚的人民性。它以总结经验裨益当世为目的，所以略古详今，着重写战国、秦、楚、汉的历史，而写当代史的比重最大：全书 130 篇中，完全写汉代的 51 篇，重点写汉代的 15 篇，汉代与先秦人物各占半数

的3篇，论述古代及汉代制度和自然、社会问题的5篇，太史公自序1篇。汉以前55篇，其中亦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占多数。

它着重反映了战国到秦汉的重大变化，如各国通过变法斗争长入封建社会的经过；从列国并争到大一统的形势；从贵族统治到布衣将相之局的发展；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确立与强盛。

它阐明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特别是经济的巨大作用。总结秦所以勃兴，由于变法以后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其所以速亡由于用兵和兴作榨取民力过多，加上严刑峻法，民不聊生。汉初与民休养生息，经济渐甦，国力渐强；到武帝时，用兵不断，兴作不已，财用日竭，又由盛而衰。

它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是单凭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而从其对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贡献观察，体现了人民的观点。

(1)它热情歌颂农民起义英雄，充分肯定其作用。把陈涉列入世家，并在自序里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就是把陈涉起义比作汤、武革命。对他的失败寄以惋惜与同情，指出：

“陈涉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承认了人民起义的力量。《史记》把项羽列入本纪，详载其英雄事迹，肯定他灭秦的大功说：“……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而将五诸侯灭秦。”这与《汉书》把项羽、陈涉都贬入列传，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

(2)它也热情歌颂社会中下层人物的优秀品质。例如表彰游侠，认为他们富有高度正义感，“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不既信，不倍言”，有仁义之风。游侠朱家救季布于困厄，及布既贵，朱家终身不复见，《史记》称其“不矜其能，羞伐

其德”。又引庄子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的尖锐讽刺，为游侠鸣不平，认为这些下层人民的侠义为统治者所远不能及。

以上这些，都表现了卓越的见识。

(3)对于统治阶级中爱国爱民、品质高尚、对政治文化有所贡献的人物，《史记》都予以不同程度的好评。例如廉蔺列传描绘了蔺相如的勇敢机智、不怕牺牲，挫败秦王，完璧归赵，和渑池会上再次挫败强秦的英雄事迹。热烈歌颂他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美德，并给以崇高的评价。同时也写出爱国老将廉颇勇于改过团结对敌的精神。特别是对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大加赞扬。细致地刻划他的竭忠尽智，正道直行，志洁行廉，并给以“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崇高评价。痛惜其怀才不遇，读其书而悲其志，凭吊其沉渊，想见其为人而为之垂涕。反复写他的热爱楚国。“虽流放，犹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归国，不忘存君兴国，终于两次被流放，所以忧愁幽思，愤世疾俗而作《离骚》，高度评价了《离骚》。对谗臣昏君严加谴责。作者热爱屈原，崇拜屈原，正因为认识到屈原热爱祖国的崇高品质。

(4)《史记》深刻地揭露封建专制统治的罪恶。如秦始皇的暴政害得人民男的力耕不足粮饷，女的纺绩不足衣服；而迷信神仙，为方士所愚弄，尤其可笑。如二世非法得位，残杀骨肉和大臣，为赵高所挟制，重税苛法，使“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于是陈、吴起义，诸侯自置为侯王而叛秦。对于汉代的王帝，作者也并不为尊者讳。对汉高祖虽然说他善用将领，不杀子婴，与秦民约法三章，能得民心；但也揭露了他的流氓习气，轻侮儒生，手段欺诈，随风转舵。特别是重点揭露了汉武帝。作者所写的景帝和武帝本纪，武帝看了大

怒，已被削除。（现存篇目是后人补写的）但《封禅书》揭露其迷信愚蠢，屡次为方士所骗。《平准书》揭露其穷兵黩武，财赂耗竭，造成豪强兼并，社会不安。又任用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等大搞均输、官营盐铁，又作告缗令，民间工商业深受摧残。设武功爵，入物补官，而吏道益杂。《酷吏列传》揭露他任用酷吏，残害臣民，法严令具，而“盗贼浸多”。在一些列传里，揭露了汉武帝比秦始皇更专制，公卿大臣都唯唯诺诺，“丞相备员而已”。

(5)《史记》阐述了儒学的演变，指出儒法的合流。认为战国时孟子提倡复古已经不合时宜，荀子探讨儒、墨、道各家行事兴坏，其所著述已不同于孔子的儒学。李斯虽是荀子的学生，但已经背弃儒学。秦始皇焚书坑儒，鲁之诸生持礼器往归陈王，孔甲当了陈王的博士，终于同陈王共死。到汉武帝提倡儒术，与原始的儒学相去更远。有名的儒家代表如叔孙通、公孙弘都是阿谀主上以致亲贵，追求利禄。公孙弘不敢面折庭争。

“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意。”活写出一副阿谀取容的嘴脸。孔子和六艺仅作为招牌而已。后来公孙弘等请置“博士弟子”，定时考试补官，定为“功令”，于是儒学成为进身之阶，作者深叹儒学已趋于末流。对于先秦法家商鞅和秦始皇，《史记》既肯定其富国强兵，统一六国，促进社会发展之功，也揭露其法令繁苛，残害百姓，导致速亡。这是比较公允的。汉代一些持严刑苛法的人，《史记》统名之曰酷吏，并不看作法家，痛斥他们“专伺上意”，“深文酷刑”，陷害臣民，却以“《春秋》决狱”装璜门面；同时公孙弘之流，既学《春秋》杂说，也习文法吏事，儒法都已经蜕变而合流，成为汉王朝专制统治的工具了。（历史事实表明那时根本不存在所谓“儒法斗争”）。

(二)艺术特点：

《史记》的本纪、世家和列传都是记叙人物活动的，它继承了《左传》等先秦史传文学的传统而又有发展，其中有不少篇目是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作品，是传记文学的典范。

(1) 它能抓住人物一生中最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在激烈的斗争场面中，通过行动、语言和细节，或直叙，或侧叙，使人物个性分明，神情毕现，栩栩如生。例如项羽是个失败的英雄，作者肯定其灭秦斗争的历史功勋，因而项羽本纪集中描绘其才气过人，英勇善战，叱咤风云，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重点写了“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战”三个片断。写钜鹿之战，以“诸侯军十余壁莫敢击秦”、“无不人人惴恐”烘托秦军的强大和战斗的激烈，用宋义的观望不前，衬托项羽的勇敢果断。又写了楚兵奋勇作战，诸侯军皆作壁上观，最后写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不敢仰视”。这样，项羽击败秦军扭转战局的特大功勋，令诸侯将慑服的情景就历历如画了。鸿门宴是刘、项争夺农民胜利果实的一场尖锐斗争。当项羽遇到函谷关有兵把守，又听到曹无伤的密报时，就“大怒”；但是听了刘邦一番花言巧语，就深信不疑，立即吐出曹无伤是告密人，失了自己的羽翼。范增三次举玦以示，他默然不应，樊哙闯帐责难，反而表示赞赏。刘邦脱逃，他毫不警觉，直到张良献璧，他还置之座上，没有意识到纵虎归山的危险。这段叙述写出了项羽的坦率，不愿暗算敌手的英雄本色，也暴露了他的粗疏，不明利害，不懂策略，骄傲自大，麻痹轻敌。垓下之围，写项羽已临自刎的前夜，慷慨悲歌，还能使左右深为感动。到溃围而出，由八百骑而百余骑、二十八骑，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还要“快战”，斩将刈旗，杀汉兵多人。亭长停船以待而项羽不愿渡江，直到身被十余创然后自刎。写出英雄

末路，令人凄恻惋惜。另一方面，《史记》也记叙了他的缺点，预示其必败，如高祖本纪引怀王诸老将语，说他“僥幸猾贼……不可遣。”又说：“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杀子婴，火三月不灭，收其妇女货宝而东，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淮阴侯列传也有类似的话，并指出：“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指出了残暴失人心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这样剪裁，使本纪突出英雄形象的主流，而其他篇目散记其缺点，补本纪之不足，反映了基本面貌。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作者还不可能认识项羽分封诸侯是倒退的措施，对项羽歌颂多而批判少。

写刘邦时，详叙了他先收买项伯，利用他去劝说项羽。到了项羽面前，又针对项羽的弱点用极其卑谦委婉的外交辞令，叙共同抗秦的旧情，表无意争王的心意，以掩盖他“欲王关中”的意图，并说什么“小人之言……”为项羽留转圜的余地，避免了在劣势中遭受突击。在宴会的紧张关头却借口如厕脱逃了险地。这充分揭示了刘邦的虚伪狡诈，善于玩弄权术的面目。

(2)对于同一类型的人物，也写出其区别。如张良与范增都是谋士。在鸿门宴里，张良恭谨而沉着，机智善应变，措辞不亢不卑；范增虽然有远见而果断，但性格傲岸，急躁易怒，细中有粗。樊哙与项庄同是勇士，但项庄舞剑出于被动，不能排除障碍完成任务。樊哙闯帐，愿与刘邦同命出于赤诚，能激昂陈词折服项羽，尽保卫之责。

又如战国四公子都以养士著名，性格亦相似。但在《史记》笔下，孟尝君几乎失冯谖，平原君几乎失毛遂，春申君因李园灭家，都不能算真识士。而且还写了平原君许多缺点，对孟尝君也有所讥刺，唯独对信陵君的“仁而下士”称颂备至。“窃

符救赵”的故事突出了信陵君礼贤下士、守信重义的品性。在寻访侯羸和引车入市一段，细致地描绘了侯生的服饰、行动，表现其傲骨，又侧记了“从骑皆窃骂侯生”，托出信陵君“执辔愈恭”、“颜色愈和”、“色终不变”。可谓刻划入微。救赵胜利后，又用赵王与平原君的言行写出窃符救赵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和信陵君礼贤下士的成果。最后又以信陵君在赵国秘密寻访毛公、薛公于酒肆和卖浆者流；再次与平原君作对比，取材与描写都是独具匠心的。

(3)《史记》语言精练，词汇丰富，绘形绘声，气势雄伟，变化有力。传记中广泛采用对话形式，把人物写活。例如陈涉对他的雇农伙伴说：“苟富贵，无相忘”、“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表现了他的理想抱负，与朴素的阶级感情，他和吴广商议大计时的“天下苦秦久矣，……为天下唱，宜多应者”一段话，表明了他深明大势，有卓越的政治才能。他对适成的同伴们说，“……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段话，表现了坚决的反抗精神，反抗宿命论思想，鼓动性极强。用词精炼生动，在叙事方面起很大作用。例如吴广故意使将尉忿恚，到陈、吴并杀两尉，寥寥数语，写出了他们的计谋和激烈的斗争场面。“攻铚、酂、苦、柘、谯”后面，用“皆下之”三字，写出革命迅猛发展，势如破竹。接着写“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起义军星火燎原之势如在目前。

《史记》还充分吸收和运用口语、民间语言，使语言更加丰富多彩，文章也具有规范化兼通俗化的特征。如《陈涉世家》载其故人入宫，见宫室帷帐，就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连乡音也写上了，使质朴中见生动。《汉书》去了“颐”字，就减少了乡土味。又如《张良列传》载周昌谏废太子说：

“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连周昌口吃和又怒又急的神情都写出来了。有时采用简短的民间语言或流传的古语作判断语，简短有力，说明问题。如《李将军列传》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货殖列传序》说，“千金之子，不生于市，此非空言也。”《佞幸列传》说“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是尖锐的讽刺。

(4)《史记》引用古书，也经过剪裁去取。如《尚书·洪范》记载武王克殷后访问箕子，和箕子的答话，《史记》译成汉代语言后就浅易通俗，简洁明朗。《左传·秦晋殽之战》在《史记》中作了节译。《国语·公子重耳之亡》在《史记·晋世家》中已近乎意译。又如《战国策》叙冯谖为孟尝君收债于薛，简单地说“矫命以债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史记·孟尝君列传》却详写了冯谖收了一部分债，置牛酒宴请全部债务人，能偿还的约期归还，无力偿还的烧了债券；还说明了孟尝君放债与收息的原因。这样一改，显得冯谖不是简单的一刀切，比《战国策》合情合理多了。

(5)《史记》中的传记所以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还在于作者不是客观主义地写历史，而是倾注了鲜明的爱憎感情，有时把自己和作品中人物溶合在一起。例如歌颂屈原实际上也在写自己，屈原忧国忧民的高尚志行，和自己的感情正相符合，他把楚国当时邪曲害公、方正不容的黑暗政治和自己身受的迫害紧紧连在一起。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与自己的含垢忍辱完成《史记》也是心心相印。司马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实际上也继承了屈原，从《诗经》的风、雅，到屈原的《离骚》，到《史记》，可说一脉相承，《史记》有浓厚的诗的激情，是伟大的史诗。

他嫉恶如仇，深刻而生动地描绘酷吏的卑劣残酷。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后为关都尉，人们说，“宁见乳虎，毋值宁成之怒”。因罪脱逃回家，还说“当官不到二千石，经商不到千万，就不能算人”，于是强占田一千余顷，奴役贫民数千家，不到几年，致产数千金。王温舒为河内太守，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流血十余里，刚逢新春，他顿足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吾事足矣”。这样一个杀人成癖的恶鬼，汉武帝却以为能干，一再给升官到廷尉。义纵为定襄太守，把重罪轻办的二百多人，连同私自来探亲的二百多人，一下都杀了，郡中不寒而慄。又如杜周，专看武帝意向，举劾很多人，穷究捕治，武帝以为尽力无私，升官至御史大夫，两子都当太守。他的残暴贪鄙甚于王温舒。初征时只一马，后来家财累至数十巨万。

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上的事情常常兴叹。读《春秋历谱谍》到周厉王，看到周室由盛而衰，废书而叹。读《孟子》到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疾官与民争利，废书而叹。读“功令”到广厉学官之路，恨儒学的堕落，废书而叹。读屈原书，“悲其志”，凭吊其投江处，“未尝不垂涕”。司马迁这种历史感情充溢于著作，所以虽然写的是散文，却和诗一样。鲁迅先生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三）《史记》对后世的影响：

（1）史学方面：除历代正史体制仿自《史记》外，还有宋郑樵作通志，唐杜佑作通典，宋马端临作《文献通考》皆仿自《史记》的八书。刘向作《列女传》仿自《史记》的列传，明万斯同作《历代史表》仿自《史记》的十表。另外，魏晋南北朝以下私人修史之风曾盛行一时；写后汉史的有过九家，写晋史的有过十八家。也是受司马迁写史的启发。到范晔后汉书成

定为正史；唐太宗又诏修晋史，于是私家的史书都废而不用。隋文帝杨坚（在公元593年）下诏禁止私人撰集国史，唐太宗（在公元644年）又设局修史，成为定例，于是修史的事都由统治者掌握。

（2）文学方面：首先是对小说的影响很大。因为《史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性格的刻划，细节的描写，语言的运用，故事情节的安排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这对后世小说的创作者有很大启发。起初，多摹仿《史记》的列传为短篇。例如《史记》的司马相如列传写他和卓文君被卓王孙所弃，卖酒临邛的情况，非常生动。西京杂记也有这一段而内容反较简略。又如《世说新语》也是由列传演变而来。后来的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到明清志怪小说，其写作手法亦受《史记》的影响。不过从文言到白话，从短篇到长篇，离开传记文学更远了。但如《聊斋志异》仍然保留传记式传统，“异史氏曰”也和“太史公曰”类似。

元以后的戏剧取材于《史记》故事的有《渑池会》、《将相和》、《霸王别姬》、《追韩信》、《文君当炉》等。

《史记》对后世散文的影响也很大。它语言平易简洁，流畅明朗，成为唐宋古文家反对古奥艰涩和排偶的旗帜。《史记》每篇结尾的史论，表达作者对史事的看法和感慨，文笔曲折尽致，概括性很强，亦为古文家所喜爱。

还有碑志、传、状都是源出于《史记》的列传。

《史记》对许多历史人物作了不同的评价，对读者影响很大。它所鞭鞑的人物，常为后世所唾弃，它所歌颂的人物，受到后世的钦慕，这在知识分子中影响更加显著。